

## 空间经济学在中国

梁 琦 黄 卓\*

**摘 要** 本文简述了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在过去二十年里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下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和国际贸易、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结合。同时,我们介绍了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2011)的概况以及入选的六篇论文。

**关键词** 空间经济学, 新经济地理学, 区域经济学

### (一)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独享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因为“一直以来,有关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区位研究都是经济思想的前沿。即使在今天,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城市化依然是大众讨论和学者分析的热门话题。但传统上,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被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然而,最近 30 年来,它们越来越走向融合。一种新的理论表明,是相同的力量同时决定了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下的国际专业化分工(贸易理论)和经济活动的长期区位(经济地理)。克鲁格曼对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诺奖评委会特别提到他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体现在三篇论文和两部著作中,其中一篇论文是 1991 年的“规模报酬与经济地理”(Krugman, 1991),文中建立了一个中心—外围模型——人们通常将其看做新经济地理学的起点(他本人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种子早已能在他 1979 年的文章中找到),一部著作是 1999 年他与人合作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Fujita *et al.*, 1999)。与以往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同的是,克鲁格曼的获奖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地理学界同样引起快速而强烈的反应。2009 年世界银行报告的题目就是《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而 2009 年的美国地理学会(AAG)年会,特别设立了一个专场<sup>1</sup>,全美地理学家济济一堂,讨论经济地理学下一步如何走。进一步的,在 2010 年的美国地理学年会上,克鲁格曼被邀请与全美地理学家

\* 梁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通信作者及地址:梁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510275;E-mail:liangqi9@mail.sysu.edu.cn。

<sup>1</sup> “Economic Geography-What next? Responses to Krugman’s Nobel 2008”

们对话。<sup>2</sup>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次会上,全美地理学家授予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荣誉地理学家”称号。

当年,克鲁格曼将自己关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工作称为“新经济地理学”(NEG),而将他们的那本书命名为《空间经济学》(以至于经常有新人花时间去探索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这都是有所思考的。显然克鲁格曼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迥异<sup>3</sup>,之所以取名为“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希望“新”和“经济地理学”联系,一方面能吸引经济学家们的眼球——将“经济地理”纳入视野;另一方面能吸引地理学家们注意——关于经济地理还有“新”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取名之初,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就意识到“新经济地理学”一词有可能会引起经济地理学界的不满情绪:你们的研究是“新”的,那我们的研究呢?因为人们一般不愿意别人侵略自己的乐园,更不愿意被人比喻成是“旧”的。当初他们就说过,不如干脆取名为“空间经济学”,这样就可避免经济地理学家们的反感(梁琦,2005)。正如他们所预见的,甚至超出他们的预见,无论是2009年还是2010年美国地理学会年会上,都有正统经济地理学家<sup>4</sup>(Martin and Sunley, 1996; Martin, 1999)对“新经济地理学”表示不满,以至于藤田昌久至今还在感叹:唉,最初直接叫“空间经济学”就好了。<sup>5</sup>但是,试想,如果从来没有“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名称,地理学界是否能像今天这样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反应如此快速和强烈,而克鲁格曼又能否在经济学奖之外再获个“荣誉地理学家”称号?

不论称谓如何,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美国,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们,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中国也同样。2011年7月2—3日,由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共同发起的“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2011)”(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patial Economy, 简称 ICSE)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召开。这次大会是由中山大学、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区域科学协会联合主办、《经济学》(季刊)协办的。两个国家一级学会共同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们在同一个平台上探讨同样的问题,这在中国学术会议史上是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我们也在抛出“橄榄枝”,希望

<sup>2</sup> 克鲁格曼在大会做了一场报告,名曰“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ow Middle-aged”,著名经济地理学家 Storper 担任点评人。克鲁格曼的同名文章作为首篇发表于 *Regional Studies*, 2011, 45(1)。本文中克鲁格曼的直接引言,均出自他的这个报告。

<sup>3</sup> 我想,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研究的是“经济的地理特征”,而地理学界的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是“地理的经济特征”。不知地理学界是否认同。

<sup>4</sup> 为了与“新经济地理学”以示区别,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在经济地理学前加上了“正统”一词(proper economic geography)。

<sup>5</sup> 有意思的是,叫“新经济地理学”,有经济地理学家反对;叫“空间经济学”,有自然科学家反对。几年前在中国,一提到“空间”还只以为是自然科学界的事。

后面某届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地理学会能参与联合举办，而且，希望这个日子早点到来。

## (二)

近20年，是空间经济学飞速成长的20年，蓬勃兴旺的20年。甚至使人感觉太招摇而引来一些不满和批评。有人说，NEG的核心模型——中心—外围（CP模型）对美国现代经济的解释力并不强；CP模型强调的有形因素（譬如运输成本）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已远不如无形因素（譬如信息溢出），而后者没有在CP模型中显现。时下困扰美国的并不是运输成本等有形因素，所以“新经济地理”研究的问题其实有些“老”，甚至于当下美国而言不合时宜。

对此，克鲁格曼本人也认为较之2010年的美国经济，CP模型确实与20世纪初美国的真实经济地理更加吻合，它可以很好地解释19世纪美国制造业和欧洲的“热香蕉”（hot banana）地带的情形（Krugman, 2011）。因此，考虑到别人的情绪，不妨做点自我批评：“自从新经济地理学起始至今，我和同伴们都有轻微的负疚感，我们都在谈论过去，而不是现在，更没有谈及未来。”但是，他话锋一转，“它是——正如我所希望的——为经济学家研究地理问题而敞开的一扇门，特别是研究产业集聚的形成。”那么，是不是我们不要囿于对CP模式的固化管理？“事实上，自新经济地理学产生以来，产业本土化，而非广义上的中心—外围模式，已成为大量实证研究关注的焦点。现在很明显的是，要素更多集中于单个产业集群，而非广义的中心—外围模式意义上。”所以，尽管广义上的中心—外围地理特征似乎更适合描述美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时期，但产业本土化、地方专业化仍然在当今美国普遍存在。不过，特征发生了一些改变。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也要相应改变：“一是在量化地方专业的手段和方法上，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二是考察地方专业化，要从细微处着眼。因为与过去的定义相比较，如今大多数的地方专业化或产业本土化都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譬如1950年的匹兹堡与今天的亚特兰大相比，一个显然是钢铁城市，另一个是什么呢？很难有明确的定义。又譬如，纽约显然是金融主导的城市，但除了纽约，大多数人恐怕都很难定义美国其他都市区的产业特征是什么，好像都差不多，每个城市都在做着差不多的事情。这就需要人们更细微地、更精准地描述地方专业化：波士顿和明尼波利斯同样都有医疗器械的集群，但是它们并非生产完全一样的东西，需要细致的观察才能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

而且，科学是无国界的。NEG主要关注制造业，尽管对于发达国家似乎更适合描绘当年制造业发展的情景，“但现在世界上那些新兴经济体的情况正如当年的美国”，克鲁格曼研究经济地理的文章开始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完全关注于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一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数据

及历史案例很容易获得;二是认为这能够很好地反映世界经济的重心,因为那个时候,在1991年,高收入国家占据了全球84%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但是今天这一比例只有不到70%,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国家制造业的飞速增长,特别是中国。”克鲁格曼断言,“中国的经济地理,非常符合NEG的框架”。这是因为“首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大量中西部向沿海地区迁徙的移民,形成了这些地区和东南部的制造业联系。应该说,这一景象的形成是因为大多数中国的工业制品是面向海外市场而非国内市场。同时,区域差异也是19世纪美国“制造业带”的真实写照。然后是关于产业区位的问题。从温州的“打火机城”(占据了95%的世界份额),到盐步的内衣生产集群,中国存在着成千上万的产业集群。”今天,世界经济重心发生了转变,克鲁格曼断言道:“在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NEG的模型对于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有广泛的应用,它对于理解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克鲁格曼隔海相望中国的时候,中国学者们早已认识到空间经济学理论于中国的适用性和重要性。正如杨开忠教授所说:“城市、移民和贸易是发达国家过去200年来进步的催化剂。现在,这些故事正在发展中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重演。现在的中国不仅仅发生着世界上最大规模、最迅速的城市化、移民和一体化,而且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国规模经济的情况(我们国家的人口是欧洲、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再加上日本的总和),经历着向知识大增长和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转型。在这几股带有根本性的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中国的经济地理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持久的、趋势性的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应该说既对空间经济研究提出了重大需求,同时也为空间经济研究提供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素材,创造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空间经济研究的土壤。所以我们这一代空间经济学者、经济地理学者,我们这一代区域科学工作者,是十分幸运的,是令全世界空间经济学者所羡慕的。”<sup>6</sup>

回想几年前,空间经济学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sup>7</sup>,但是今天,我们

<sup>6</sup> 引自中国区域经济协会会长杨开忠教授在“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2011)”的致辞。

<sup>7</sup> 2005年,为了向大众宣传空间经济学,我写了一篇文章向《光明日报》投稿,却泥牛入海无消息。2006年的一天,突然接到《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的电话,约我将文章缩减篇幅发表,我当时很纳闷,为什么一年多后才能发表?后得知,当时有自然科学家提出异议。这就是后来于2006年7月17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空间经济学:多学科融合与创新”(2007年被选为“2006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的相关文章)。《光明日报》配了个“编后”说:“梁琦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们是去年收到的,恰巧,同期我们也收到了自然科学界一位专家质疑经济学家‘跨界’研究空间问题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篇稿件我们均没有采用。今年以来,《经济学》专刊拟逐步增加学科前沿观察述评类文章的推介力度,于是约梁教授对原文作了压缩和调整(见报时仍有删节)。……说到对空间的‘跨界’研究,我们认为,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界研究的是空间的自然现象和规律,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在一个知识创新的年代,不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应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面对新事物的发生(有人以为‘空间’仅是理工类学科的专有名词,习惯上一看到‘空间’便联想到诸如太空飞船或者物理粒子等),打破一种思维定势,加强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促进学科的融合,也许更利于理论创新”。

欣喜地看到，中国学术界已掀起空间经济学浪潮，首届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2011）吸引了包括国际区域科学协会副主席在内的、来自美、英、法、日、瑞典、意大利、伊朗和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180多名专家学者，大会有11个主题报告，并分12个分会场报告了150多篇论文，交流了空间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空间经济学的发展意义深远，它表明中国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已受到世界的瞩目。

### （三）

我们挑选了6篇中国学者讨论中国问题的论文组成这个专辑。

六篇文章中有三篇与贸易有关，分别是熊灵、魏伟、杨勇的“贸易开放对中国区域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1987—2009”，该文在新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框架下，构建贸易开放与区域增长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1987—2009年间中国省际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金祥荣、刘振兴和于蔚的“企业出口之动态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2001—2007”，该文对中国企业的出口选择及其学习效应进行了研究；许德友和梁琦的“贸易成本与国内产业地理”，该文以贸易成本为核心变量，在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一体化对国内产业地理的影响。

之所以选择与贸易相关的论文占比如此大，是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渊源及其中国实践两个角度的考虑。

一方面，从理论渊源来看，克鲁格曼的开创性贡献是“通过将规模经济融入清晰的一般均衡模型，加深了我们对贸易决定因素和经济活动区位的理解”。其实贸易的地理特征是与生俱来的，贸易与地理密不可分的思想在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1977年）得主——贝蒂尔·俄林（B. G. Ohlin）那里已充分体现，只要随手翻翻他的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1931）即可知（梁琦，2008）。克鲁格曼本人是新贸易理论的开创者，他也是在研究欧盟经济一体化趋势中，逐渐形成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他将在欧洲的学术演讲系统化整理就有了《地理与贸易》，地理学界常将这本书看成是新经济地理的起源）。最先意识到经济体是有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来自国际贸易领域<sup>8</sup>，只因贸易有天生的空间特质。从俄林到克鲁格曼、维尔布尔斯<sup>9</sup>，等等。在中国，主流经济学渗入空间

<sup>8</sup> 克鲁格曼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意识到经济体并不是没有空间维度的点”。我认为这句话应该只是在特定语义下成立。俄林在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1931）中，就已非常肯定和明确地表明了贸易和地理的关系，也用规模经济来解释贸易模式。对于贸易与地理的关系的思想，克鲁格曼和俄林如出一辙。但是，两人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完全不同的。《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是俄林在他1924年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的，而那个时代，如保罗·萨缪尔森形容，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

<sup>9</sup> Anthony J. Venables,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著名国际经济学家。

经济学也是从国际贸易领域开始的<sup>10</sup>，正与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源泉”观点很吻合。

另一方面，从中国实践来看，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是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所决定的。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国际贸易，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东南沿海成了“世界工厂”，以至于克鲁格曼面对中国都在思考：“局部区域的产业占据了主要的全球市场这一现实是否会引起我们对NEG逻辑的重新思考呢？是也不是。我认为为了考察‘中国模式’产业地方化的福利效应，我们必须从国家层面考察嵌入更为广泛贸易系统之中的外部规模经济，这在我最初的NEG框架中并未考虑。当然这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突破，毕竟这基本上是对NEG和新贸易理论的一个整合，而新贸易理论又是NEG最初的来源。”呵呵，就连克鲁格曼都在憧憬着，在开放的中国，将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结合起来研究，空间经济学理论可望实现新的突破。我还想说，不仅是将空间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同时也与城市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结合起来，是空间经济学研究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另外两篇文章分别是赵墨、石敏俊和杨晶的“市场邻近，供给邻近与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基于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陆铭和向宽虎的“地理与服务业——内需是否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前者是利用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制造业空间分布和区域增长差异成因与机理；后者是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从劳动生产率视角探讨距离与城市层级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及其与制造业的比较。前者用国内区域数据，后者用国内城市数据，两个实证研究都有各自的特色。

国内部的经济地理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特别对于大国，国内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同样重要。克鲁格曼说：“我希望空间经济学能为国民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些指导。希望新的焦点将促使经济学家去使用具有国家内部数据的‘知识和经验实验室’，这方面的应用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利用城市和区域数据去处理重要的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正在不断涌现。”

空间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在哪里”，城市、区域、产业和贸易都是空间

<sup>10</sup> 就我本人来说，由于长期在南京大学国际贸易系任教，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自然而然地跟踪新贸易理论创始人保罗·克鲁格曼的工作。作为空间经济的主线——“产业集聚”在中国如此热门（不仅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如此热门，而且在中国大地耳熟能详：各省、市、县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规划或报告中，无不提及，无处不在），这可是在我当初为“agglomeration”的中文究竟是翻译成“集聚”好还是“聚集”好而反复斟酌颇费一番心思时完全没有想到的（最后我选定译为“集聚”是认为先有“集”才有“聚”）。而且，至少在2002年以前，“产业集聚”一词是没有英文的，当时可检索的英文文献中只有“spatial agglomeration”和“industry cluster”，还从来没有见过“industry agglomeration”，我的博士论文（后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最初定名为“空间集聚论”，但预答辩时导师们都认为“空间集聚”一词太新，担心太新、太眩而难以被经济学界认同，于是建议我改为“产业集聚论”。可是，在我当时阅读的两百多篇英文文献中，从没有见过“industry agglomeration”，我也不敢自造英文新词汇，所以，我就没有为我的博士论文取英文名（只有英文摘要而没有英文题目）。真没想到，如今英文 industry agglomeration 也成了流行词汇。

经济学的主要模型。张幼文教授说，“近30年来，正是因为世界知道了‘到中国去生产’，使得世界经济变了面貌。本届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是从空间经济学思路讨论中国对外开放问题，将把中国开放型发展推进到一个理论思考层面。目前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一个新问题需要回答：我国发展战略将进入中西部大发展的新阶段，在开放条件下产业分布规律将产生什么影响，中西部与东部的关系，中西部吸收国际产业转移与东部的差异性。等等。我们要探索清楚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空间分布的特征规律，将有利于从国家全局思考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战略，而不只是注重政策激励问题。这对中国的意义重大。”<sup>11</sup>中国也正经历着从城市到城市圈、城市带到城市层级体系的空间蜕变，城市化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中国和世界都需要探索经验。中国也正面临着国际分工的新形态和新趋势，进一步改革开放也遇到瓶颈。所有诸如区域、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分工、区际分工、经济一体化等热点问题，是中国实践不断地向空间经济学提出的一个又一个复杂而又生动的课题。所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空间经济思想和经验实验室”，我们鼓励应用空间经济学理论针对中国现实问题做各种实证研究。

梁琦、丁树和王如玉的“总部集聚与工厂选址——基于运输成本、交流成本和税收政策的考察”一文，是针对我国当前的热词之一“总部经济”而作的。总部经济的地理特征就是总部集聚。该文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总部经济的文章不少，看法很多，议论很多，但真正用主流经济学方法来考察总部经济的论文还没有。这篇文章抓住总部经济的地理特征本质，用数学建模方法阐释总部集聚与工厂转移的现象，它的价值在于，对于我国大都市总部经济战略和产业转移战略有着理论指导意义。

选择这篇纯模型的论文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抽象模型是空间经济学的基本构成部分。现代经济学的—个特点就是数学建模，数学建模的优越性就是可以回答“如果怎么样”的问题，即如果某个变量发生变化，将会怎样影响经济发展？主流经济学在很早以前就决定把抽象模型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构成部分。<sup>12</sup>“所有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寻找支配世界的规律，而通往这个目

<sup>11</sup> 引自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张幼文教授受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委托在“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2011)”上的致辞。

<sup>12</sup> 何时以及缘何做出这种决定？克鲁格曼认为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3)是分水岭。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随着对历史—制度因素的极度重视，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但随着大萧条的止住，急需寻求问题的答案，即回答“我们要做什么”。面对这个问题，制度经济学家一筹莫展；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尽管包含偶然的历史风格，但本质上展示了一个抽象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事情是，它回答了“去做什么”的问题：通过刺激需求来解决开支赤字问题。保罗·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分析导论》将凯恩斯经济学引入到大学教学，也带来了崇尚模型的风气，并摒弃了制度方法。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提供有用的答案，正如凯恩斯所做的一样。

标的理所当然的途径是建立模型,从而能够进行思想实验,即提问“如果是X发生而不是Y,那么事情将会怎么样?”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如是说。<sup>13</sup>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有意思的词,叫做“非催眠属性”(no-dormitive-properties,大意指模型结果是推导而来的,注重逻辑演绎而非主观推测),援引自Molie're's医生,他曾高调宣布“鸦片催人入睡是由于它的催眠属性”。科学家们对这类催眠属性说很不以为然,譬如,如果你对“集聚”侃侃而谈却没有任何逻辑演绎,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就会十分疑惑地反问“那么你就是说,集聚是由于集聚经济?”避免这种催眠属性说,就是抽象模型的用途之一。我这里不妨再将这个术语望文生义地扩展一下,光凭主观推测的泛泛而谈具有催眠属性,除非演讲者口才十分了得,否则听者难免昏昏入睡;而凭逻辑演绎的论述具有非催眠属性,因为即便是想否定你的人,也得打起精神仔仔细细看那一步步推导,希冀从中找出错在哪一步。

抽象模型离不开假设。模型的假设与现实不符,总有人对别人提出这样的批评。NEG也受到这样的批评。其实,对假设的认识,是个科学素养问题(梁琦,2007)。任何一个命题,都由假设和结论两部分组成。任何一个结论,都是在一定的条件满足下才成立。在科学上,理论的意义越重大,假设就越是抽象的。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其假设完全不合现实,但却奠定了力学的基础。我在这顺便说道,改变模型假设进行推导的能力是学术水准问题:如果将假设条件放宽仍能推出结论,或假设条件不变得得到更强的结论,都是一种创新;但如果假设条件更严格,却也只得到同样的结论甚至结论变弱,这种“创新”是虚假的。<sup>14</sup>如果吹嘘这种“创新”,则是学术品格问题了。

另外,空间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演化”,Ad hoc dynamics是常用方法。

<sup>13</sup> 正统经济地理学家认为,他们研究的是“真实的地方”(real places),重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历史对区域发展和产业集聚的影响。他们批评新经济地理学虽然也考虑了历史因素,但历史在那里只是个“黑匣子”,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学依赖于模型,假设远离现实,推导过程抽象,失去了正统经济地理学的丰富性和复杂多样性。而且,“新经济地理学”对精确热衷却对现实轻视,根本就不经济地理学,只能说是“地理经济学”。克鲁格曼承认当代主流经济学崇尚模型的风气,并认为如果像正统经济地理学那样总是强调个案的独特性及历史的特殊性,那么将注定无法回答“我们要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但这正是新经济地理学准备回答的问题。他还指出,模型的意义包含政策含义,譬如自己1991年那篇关于中心—外围模型的主要结论正是模型的政策含义,即经济体的地理结构取决于几个关键变量: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要素流动。如果一定要说经济学崇尚模型不好,那么反问,为什么崇尚模型的经济学还如此重要?“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主流经济学并不会走向没落:不管喜欢不喜欢,美国白宫有经济顾问委员会而没有地理顾问委员会。世界银行雇用了大量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地理学家,诸如此类。所以,如果地理学观点想要取得应有的影响力,它们应该与经济学进行一些和解。更根本的是,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可能存在盲点,但却很有威力和深度;经济学应该在不牺牲自身优点的前提下,向地理学学习。”

<sup>14</sup> 如果原命题是从三个假设推出结论A,你将条件放松,譬如三个假设中减少一个,变成两个,仍然推导出结论A,这是一种创新;如果假设仍然是三个,但推导出一个更强的结论,也是一种创新。但是如果你将条件加强,譬如再加上一个新的假设,变成四个,仍然只推导出结论A,这就毫无意义了。但经济学界有一些论文或者博士论文,经常在“创新点”中表述这种虚假的“创新”。而在数学界是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在不同参数下，模型多重可能结果出现：似乎，无论从美学和历史学的观点，都比必将出现某一个固定的结论的模型更加有趣”（克鲁格曼语）。这也保证了模型为经济学所用，回答“如果怎么样”的问题。

最后，中国这片广袤大地上正在发生的空间巨变是深邃的空间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最好实验场，让我们共同为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而努力。

## 参 考 文 献

- [1] Fujita, M., P. Krugman, and A. 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梁琦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 [2]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83—499.
- [3] Krugman, P.,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ow Middle-aged”, *Regional Studies*, 2011, 45(1), 1—7.
- [4] 梁琦,“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与未来”,《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4期,第1068—1086页。
- [5] 梁琦,“经济学应当向数学学什么”,《经济科学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11期,第5—11页;《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第53—55页。
- [6] 梁琦,“2008年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学术成就评述”,《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6期,第54—59页。
- [7] Martin, R., and P. Sunley, “Paul Krugman’s Geographical Econom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A Critical Assessment”, *Economic Geography*, 1996, 72(3), 259—289.
- [8] Martin, R., “Critical Survey. The New ‘Geographical Turn’ in Economics: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23(1), 65—91.

## Spatial Economics in China

QI LI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O HUA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overviews the developments of spatial economics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twenty years. We suggest tha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patial economics in China is the further mix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patial economics

---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urban economics, reg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also summarize the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patial Economy and introduce the six papers from the conference published in this issue.

**JEL Classification** O18, R11, R12